

导 论

一、关于同盟理论问题研究的若干思考

同盟 (alliance)^①，从字面上讲是指几个国家通过条约而结成的联合体 (Union of states by treaty)。从历史上看，自从人类有了集团间的争斗，寻求盟友这一古老的方法就被采用。无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古希腊、罗马，结盟对敌的史例不胜枚举。一些睿智的战略家甚至还提出了结盟的原则和秘诀，如“远交近攻”“合纵联横”等。尽管如此，近代以前的结盟行为，还带有原始的色彩，这种关系还不能算做严格意义上的同盟。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北意大利诸国开始有意识地追求势力均衡，结盟行为大量出现并日趋规范。十七世纪，随着西欧国际体系的形成，主权国家的结盟实践更加频繁，调整主权国家间无序状态的国际法渐渐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同盟也就出现了，虽然说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同盟，但那时的同盟又与现代同盟存在很大差别。在近四百年的国际关系史上，出现了无数同盟，如何对其总结概括，这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的一项重要任务，虽已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距问题的圆满解决，还有不小的差距，尚需继续努力。

所谓同盟是指感到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威胁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通过条约、宣言、声明而结成的联合体；或者是对自己在

^① 《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第3版，第33页。

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或权利不满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以上列诸形式结成的联合体。为了抑制对手的行动，防御对手的攻击，改变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扩大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权利，满足自己对领土和势力范围的要求，联合体规定相互协作，共同行动。^① 举例来说，如 B 国害怕 A 国有侵略之意或认为在国际间的实力较量中，自己的力量不如 A 国，而 A 国又对它构成潜在的威胁，那么 B 国就会寻求与自己有共同利益的国家结成同盟；又如一国对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权利不满，它也会寻求能协助自己改变这种处境的盟友。总之，同盟是国与国之间在实力较量中使用的最普通、最传统的一种方法。同盟的基础是共同利益（结盟诸国都可从中获益），为了共同的利益，结盟诸国履行约定相互合作，只有这样同盟才能维系。同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同盟又有不同的内涵。同盟的目的，结盟的形式，同盟的运营都会呈现不同的特点。^② 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对同盟加以考察。

（一）同盟的目的

从同盟的定义上，我们可以看出，同盟的目的就是通过与他国力量的结合，在相互补充，共同行动的基础上，增强自己的实

西方学者对同盟的定义一般只强调：感到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威胁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通过条约、宣言、声明而结合成的联合体。但笔者认为同盟还应当包括另外一种类型，即尽管它们并没有感到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威胁，但它们对自己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和所享有的权利（包括领土划分、殖民地占有及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权等）不满，也以上述方式结成联合体，互相合作，以改变这种秩序和处境。前一种类型更多是防守型同盟，后一种则更多地带有挑战色彩。前一种同盟的目的主要在于抑制对手的行动，防御对手的攻击；后一种同盟的目的则包括改变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扩大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权利，满足自己对领土和势力范围的要求等。过去所说的同盟一般指军事同盟，即盟国之间承担一定的军事义务，现在因为又有政治同盟、经济同盟等提法，所以我这里没有限定盟国之间采取什么样的协作方式。

参见《ブリタニカ国际大百科事典》TBS-ブリタニカ1972年版，第426页。

力，以便减轻对手威胁的程度，或改善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综观历史上的历次结盟，其目的概括起来可有以下几种：

第一，作为同盟最核心的目标，便是安全保障。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结盟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把自身的安全保障作为结盟所要达到的目的。当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他们对安全的理解大不相同，但追求安全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第二，与安全保障目标相联系的另一个目标是结盟诸国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以同盟的力量来维持某种现存的国际秩序。也就是说，为了维护对自己有利的世界格局或地区格局，既得利益的国家为了防止在这种秩序下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对现存秩序的挑战，也会结成同盟。例如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反法联盟通过维也纳会议，确立了“维也纳体系”。得益于“维也纳体系”的英、俄、奥、普为确保自己的既得利益，防止法国东山再起，便于1815年结成“四国同盟”。这个同盟的目的便是：共同维护反法联盟诸国与法国缔结的和平条约，监督和督促法国严格和忠实地履行与条约相关的特殊规定，并且共同保证维也纳会议上有关领土的划分必须维持。

第三，同盟的缔结也有出自国内因素的考虑。一国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镇压可能出现的叛乱和破坏活动，它也会寻求盟友的支持和保护。这种同盟在二战结束后两大阵营对立时期表现得极为突出，共产主义和左翼人民政权纷纷加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寻求苏联的支持和保护；与之相反的“自由”国家，则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寻求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

第四，有些国家和别国结盟，还有提高自己国际地位，改变自己在世界上形象的目的。二十世纪初，日本与英国结盟，使一个曾倍受欺凌的亚洲国家，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号强国英国的盟

友，跻身世界列强之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最后以战胜国身份出席了巴黎和会，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中的形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再次加盟，与英美苏合作对敌，从而跻身于当时世界强国之林，成为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四强之一。

第五，在旧霸权力量衰微，均势格局出现动摇和倾斜的情况下，一些对现存国际秩序不满的国家也会以同盟为手段，向现存国际秩序挑战，要求重新分配领土、势力范围和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德国不满足自己在瓜分殖民地中所占的份额，伙同走卒结成同盟，向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挑战而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又与日本、意大利结盟，向凡尔塞—华盛顿体系挑战，以图建立以法西斯国家为领导的世界“新秩序”。

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出于经济目的而加入某一同盟。大国之所以与小国结盟，除了获得政治、军事的好处外，其中还抱有借同盟牵制小国的目的。

这里必须搞清，一个国家结盟的目的和它从同盟中所获得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而且一个国家结盟的目的也决非以上所列各项的其中之一，它可以同时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目的。即使在同一个同盟中，由于国家的不同，时间的不同，其对同盟的期待也不相同。

（二）同盟的选择

同盟的选择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要不要结盟；第二层含义是与谁结盟；第三层含义是结盟的程度。这里既要考虑必要性的一面，同时又要考虑可能性的一面。

同盟对一个国家来说，它既有有利的一面，同时又有不利的一面。它好比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其利无穷；使用不当，则

伤敌不成，徒伤自己。因此，一个国家要不要结盟，这主要看结盟对这个国家来说，利弊哪个更大。详细来说，因结盟而引起的利弊关系有这么几组：从同盟的安全保障方面来说，同盟虽然能增强自身的力量，但与此伴随的，同盟也因为明确了针对对象，从而刺激了敌人，甚至促成敌对同盟的产生，即同盟虽增加了朋友，但同时也刺激了敌人。结盟国虽受到同盟国的保护，同时也产生了挑衅，使敌方提高了警惕。另外同盟虽能扩大自己的影响，但同时也限制了自己行动的自由。大国与小国结盟虽能得到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好处，但也要为此承担较多的责任和义务。小国与大国结盟虽能得到军事上的保护，经济、政治方面的援助，但却要因此牺牲自己的独立自主性。自古以来，外交的目的无外乎增加朋友，减少敌人，但只要选择结盟政策，就无法“鱼与熊掌兼得”。那么，采取不结盟的政策是否就万无一失了呢？也不尽然，在充满激烈竞争的现实国际政治中，马基雅维利对中立政策的批评依然有几分道理。他说：“如果你不公开表态，你将来总要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而使那个战败者因排解了心中的积忿而心情愉快。这时你也提不出任何理由和任何事情为自己辩护，也无法使任何人庇护你，因为胜利者不需要在处于逆境时不援助自己的可疑的朋友；那个失败者也不会庇护你，因为你过去不愿拿起武器同他共命运。”^①选择结盟是为了增加朋友，选择中立是为了减少敌人，在激烈斗争的国际政治中，如果不想制造敌人，也就得不到朋友。一个国家之所以选择结盟，首先是基于结盟所得超过所失的认识。在通过结盟以实现某项预定目标时，决策者都要权衡利弊得失，考虑结盟比独来独往多出哪些差额效益。这里我们无法断言结盟的好坏，因为要不要结盟，会因为国

家不同、时代不同、决策者认识水平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选择，而且影响结盟选择的还有民族传统、国际形势等因素。

如果选择了结盟政策，也就解决了必要性问题，接着必须选择的是与谁结盟，即结盟的对象国。其实这一选择与第一个选择密切相关，要不要结盟，在权衡利弊时，就必须考虑结盟的对象。选择结盟对象，实际上就是在必要性的基础上，开始考虑可能性问题。这时，首先必须明确自己对这个同盟期待什么，或追求什么目的；其次要对相关国家进行分析评估。一要分析它能否满足自己追求的目标，二要看它是否有结盟的意愿。比如十九世纪末，英国痛感无法继续坚持其“光荣的孤立”的外交传统，她曾考虑与中国结盟以维护其远东利益，甲午一战，清政府因腐败无能遭致惨败。接着英国又考虑与德国结盟，但因德国支持俄国向东发展，借以减轻法俄联盟对自己的压力，这与英国借同盟之力保护远东权益的目的发生冲突，所以与德国结盟的计划也无果而终。最后英国才选择了日本，甲午战争使英国对日本的实力有了新的认识，而且日本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觊觎必将与向东发展的俄国产生矛盾，这样联合抵抗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就成了日英同盟共同的目标，与日本结盟就有了基础。最初日本也没有与英国结盟的打算，它本想与俄国妥协，以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条件，换取俄国对它在朝鲜利益的承认。但俄国根本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它不仅对中国东北表现出强烈的欲望，而且对朝鲜也表现出极大的野心。日本见与俄国妥协无望，又发现英国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开始发生变化，英国对远东的关心与日俱增，结盟热情日益高涨，日本这才抓住机会，与英国建立同盟。

最后必须选择的是结盟的程度，这是同盟选择的关键，也是缔结同盟过程中，外交代表谈判艺术的具体体现。这里既有同盟

的规模问题，又有共同行动中结盟诸国所承担的义务问题。每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在缔结同盟的过程中，都懂得按经济方针办事，即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高的利益。同盟的规模绝不是越大越好，其成员越多，越容易产生利益分歧，同盟也就越不稳固。但同盟的规模更不是越小越好，参与者结盟的规模是它们确信足以稳操胜券的规模，而不是更大或更小。同盟的规模原则就是在具有充分和准确的情报下，使同盟力求有一个恰好为胜利所需要的规模。至于同盟诸国在共同行动中应承担多大程度的义务，同盟诸国以何种方式合作，因为它与结盟国利弊得失密切相关，所以在同盟选择中，在同盟缔结中，都是各国最为重视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既有铁板一块的同盟，如 1939 年缔结的德意军事同盟，它规定：一旦应援事由发生，同盟国将倾全力在军事经济方面给予援助；也有缔约国反应相对漠然的同盟，如 1951 年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签定 ANZUS 条约（A: Australia, NZ: New Zealand, US: USA），它只规定：缔约国为对付共同危险，依照各国的宪法程序采取行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哪种同盟好，哪种同盟不好，这必须根据国际形势及缔约国自己的情况做具体分析。

影响同盟选择的因素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做出同盟选择既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从国内因素来看，既有出于政治、经济的考虑，也有源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甚至领导者个人感情方面的因素。从国际因素看，错综复杂彼此矛盾的国际斗争格局直接影响着同盟的选择。但归根结底，同盟选择的最主要和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决策层基于对国家根本利益和该政权自身利益的认识，在权衡利弊得失时的判断和选择能力。

（三）同盟的内涵

作为一个同盟，它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到底什么样的关

系才算同盟？不仅学术界没有统一意见，而且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也无一致的标准。综观历史上的众多同盟，以下几条可权作同盟的内涵。

第一，结盟国的利益表述。前面说过，结盟政策的选择，是决策者基于结盟对该政权或国家来说，利大于弊，得多于失。所以一个同盟首先必须具备结盟国之间相互认可的利益表述。例如在日英同盟中，日本承认英国在中国的特权，同时英国也承认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的利益；又如在日德意三国同盟中，日本承认德意在建设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德意则承认日本在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第二，应援事由的表述。同盟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结盟诸国相互合作，共同行动。但这并不是说只要结成同盟，便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相互援助，关于缔约国在什么情况下承担援助盟国的义务，每个同盟都有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即所谓的应援事由。比如第一次日英同盟的应援事由是在另一国或数国加入对同盟国的战争时，^① 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应援事由是任何一个缔约国遭到至今尚未参加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的国家进攻时。^② 另外有的同盟还规定了在出现应援事由的情况下，履行应援义务的具体程序。这些程序包括：一旦应援事由出现，同盟国便立即自动履行应援义务的“一触即发”型；和应援事由出现后，结盟国经过协商然后采取行动的“协商”型。

第三，应援义务的表述。一个同盟之所以起作用，就在于结盟国相互之间许诺承担互相援助的义务。所以在一个同盟中，各缔约国具体承担什么样的义务，都有很清楚的表述，而且绝大多

参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册，三联书店，第145—146页。

^②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别卷·资料编，朝日新闻社，1988年版，第337页。

数同盟除了正式结盟条约外，还签有秘密条款或具体的合作细则。比如日英同盟成立后，日英又签定了日英军事协商，日德意三国同盟建立时，日德意之间又订立了军事协定。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同盟中各个结盟国都必须承担援助义务，有些同盟，只是结盟的一方对其他结盟国承担义务，例如在新日美安保条约中规定：当日本遭受攻击，美国负有保护日本的义务；而当美国遭受攻击时，日本并不需要承担援助美国的义务。这种同盟一般被称为“片务性”同盟，在这种同盟中，承担义务的国家并非一无所获，它通过保障同盟国的安全，来维护它在本地区的利益和国际体系的安定，而且它还可以以此来控制被保护国，使它们在国际社会中扮演“应声虫”的角色。不承担义务的被保护国虽从同盟中获得了安全保障，但却因此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第四，同盟国协力程度的规定。一般来说，二战以前同盟国的军事协力无外乎相互配合作战，经济协力也只不过给予物质和资金的援助。而二战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武器的进步，要求对付危机必须迅速、快捷。这样同盟国组建统一军队，在重点地方建立军事基地就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经济协力也突破简单的援助而开始实现一体化。

第五，同盟的时效、范围规定。历史是发展的，国际政治形势是变动的。由于各国实力发展不平衡，导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不平衡，这样就使旧的同盟解体，新的同盟产生。有鉴于此，绝大多数同盟都有时效的规定，即同盟的有效年限及同盟解散的程序。另外由于结盟的目的不同，同盟所适用的地理范围也就有不同的规定。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它的适用范围也会做相应的调整，比如第一次日英同盟，适应范围仅限于中国和朝鲜，而第二次日英同盟却把适应范围扩大到印度。当然最明显的例子还是日美同盟，最初其适应的地理范围只有日本本土，但现在它的适

应范围已扩展到亚太地区。

同盟的内涵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结盟各国的利益表述会日渐堂皇，而且还能更多地体现公平原则，更多地代表人类的共同利益。同盟国协力的方式和程度会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而出现许多变化。另外，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未来的同盟究竟会是什么样子，或者是否会存在，现在尚无法断言。

按上述同盟内涵各项，我们可以对同盟作简单的分类，可以较清楚地看到历史上所出现的不同类型的同盟。

（四）影响同盟运营的因素

同盟运营情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同盟的作用及对该同盟的评价。而每一个同盟的运营情况又千差万别，直接论述同盟的运营很难下手。如果试着考虑一下影响同盟运营的各个因素，那倒可以归纳出以下几条。

第一，作为同盟基础的共同利益与各结盟国对该同盟的期待之间的差值。当这两者越接近，同盟运营情况就会越好，而当这两者之间出现较大距离时，要么同盟解体，要么同盟名存实亡。作为同盟，结盟诸国一定存在利益上的一致性或互补性，但这种一致性或互补性并不永远存在。我们再以日英同盟为例，1902年日英结盟时，他们的共同利益是在东亚阻止俄国的进一步扩张。这与日英对同盟的期待完全吻合，所以结盟之初，同盟运营良好。但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在东亚的扩张被击退，日英间的共同利益淡化，这时日本企图借日英同盟进一步加强它在亚洲的地位，而英国关心的却是欧洲和印度问题，并对日本进一步强大也心存疑虑。所以此后日英同盟的运营就大不如前了。

第二，同盟对象国或对立集团的变化情况也直接影响着同盟的运营状况。每一个同盟，都有它的针对对象，它的存废，运营好坏，都与所针对对象的力量变化密切相关。当所针对的对象力

量强大时，同盟国之间的关系也就密切，同盟运营也就顺利；但当针对对象力量增强并超过一定限度，使对峙双方力量悬殊，同盟运营也会不灵，甚至出现同盟解体。当针对对象力量减弱或内部发生突变，从而使其对结盟国的威胁减轻，同盟内部便会产生裂痕，同盟运营也就日趋不顺。比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下使日美同盟、北约出现了危机，使日美矛盾、欧美矛盾表面化。同盟的运营根本无法与七十年代相比。

第三，同盟之外国际局势的变化，同样影响着同盟的运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决不只存在两个对立的同盟，在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国际政治舞台上，总是存在相互交错，纷繁杂乱的矛盾关系，整个世界局势呈现复杂多变的态势，当整个国际局势趋于紧张时，各个同盟的运营就基本良好，而当国际局势趋于缓和时，同盟内部就会出现分歧，或者说同盟内部的分歧才表现出来。

第四，同盟诸国社会形态、政治文化及价值观的差异也影响同盟的运营。如果一个同盟内部，各国的社会形态、政治文化及价值取向相同，那么该同盟的运营要相对顺利。反之同盟运营就会出现更多的麻烦。二战时期美英苏反法西斯同盟的运营便是很好的例子。

第五，结盟国的政治制度、权利结构，特别是对外政策决策机制，对同盟的运营有着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集权国家之间的同盟，其运营要相对顺利；而分权国家会因国内政治制约而使同盟运营不畅。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究竟应该怎么发展？同盟是否还会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要形式？在国际局势日趋缓和，全球利益、全人类利益日渐突出的时候，同盟是否将会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消失，亦或是其内涵发生变化，我们将拭目以待。

二、日英同盟、三国同盟成立的背景、经过及研究状况

（一）日英同盟成立的背景和经过

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统治者认识到：军事胜利的成果，如果没有外交做保证，将很难巩固。所以他们开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寻找自己的伙伴。它注意到英国并没有参与对日本的干涉，所以当在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甲午战争之后，威海卫暂由日本占领）时，日本也给予了善意的合作。英国原本依仗自己优越的地理位置、宽广的殖民地、强大的海军实力和发达的工商业，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光荣的孤立”的外交政策，从不事先与任何国家结成固定的同盟，但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英国的霸权进行挑战，不论在殖民地的争夺上，还是在海外工商业利益的维护上，英国都日益感到单靠自己的力量已无法维护昔日“辛苦”夺来的权益，特别是面对其他国家以联盟的形式进行的挑战更是无力应付，所以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英国也开始寻求自己的盟友。

由于欧洲殖民者争夺殖民地是从拉美和非洲两个方向席卷而来，到了十九世纪末，矛盾的焦点逐渐聚集到东北亚地区。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各帝国主义大有肢解中国的趋势。当时英国以其首开中国大门和强大的工商业实力在中国占有别国无与伦比的利益，如果中国遭到肢解，它的利益将受到极大影响。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它自明治维新后，一直处心积虑地谋求扩大在大陆的权益，如果中国被众列强肢解，它不但将失去掠夺的对象，而且自己被掠夺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在中国，1898年开始的瓜分狂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1900年义和团运动），而借镇压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列强又伺机肢解中国，在这方面俄国走得最急。由于在瓜分中国时矛盾难

以调和，最后列强达成共识，即由列强共同支配中国、任何列强不得在中国谋求领土利益或排他性殖民地。俄国虽然参与了列强对义和团运动的处理《辛丑条约》，但它并没有打算把已经占领的中国东北无条件地交给中国，也就是说它不愿意在处理中国东北问题时受列强所达成的共识的约束。日本原本想利用这一点与俄国达成妥协，遭到俄国的拒绝；英国试图借此与俄国实现全面和解，也没有达到目的。为了遏制俄国的扩张，英国与德国、美国结盟的努力也相继失败。这样到处碰壁的英国与急切寻求后援抵抗俄国的日本便结成了同盟（1902年1月）是为第一次日英同盟。

日俄战争俄国的失败不仅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在短期内不可能再对英国造成严重影响），而且对欧洲的局面造成一定的影响，英国一向以维护欧洲均势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俄国既败，德国势力必然陡增。为保欧洲均势，英国必不可使俄国过分削弱，日本作为英国盟友，且对维护英国在远东利益大有用处，所以英国一方面“力劝”日本勿提过于苛刻的媾合条件；另一方面又与日本续签同盟条约，使日本无担心俄国报复之虞。这便是1905年签订的第二次日英同盟。

日英同盟虽使日本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和朝鲜的地位大增，而且在商业上俨然成为英国的劲敌，但英德矛盾的激化和日俄关系的密切使英国担心一旦废除日英同盟，形势将对自己更为不利。日本因日英同盟大受其利，这时当然希望继续利用它谋求扩大在中国的权益，并使俄国断绝复仇之念。所以，1911年7月13日，第三次日英同盟条约得以签订。

（二）三国同盟成立的背景和经过

1929年的大危机对脆弱的日本经济是个致命的打击。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开始向大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权益。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1922年华盛顿会议之后，列强已对

远东做出安排：列强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中国对列强“门户开放”。这种安排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是意在调解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冲突，防止某个列强在中国建立排他性的独占殖民地。当世界范围的大恐慌袭来时，各国为了自己的私利，不再顾及国际协调，为了尽快摆脱危机，英法美等国积极构筑排他性的经济区。这样国际市场依赖性强、但又缺乏广阔殖民地的日本，便向华盛顿体系发起了挑战。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持伪满，以建立排他性独占殖民地。为了维护华盛顿体系，西方列强曾企图借国联的力量，迫使日本退回到华盛顿体系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但由于列强当时更关心地是如何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他们不愿意为远东利益耗费更多的精力。1933年日本为了表示对列强限制它肆意侵华行动的不满，退出国联并进一步扩大侵华事态。

与日本相呼应，1933年上台的希特勒政权打着复兴德国的旗号，向一战后确立的凡尔赛体系进行挑战，进驻莱茵非武装区，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退出裁军会议和国联。当时另一个法西斯国家意大利也不甘落后，墨索里尼以古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妄图把地中海变成“意大利的海”。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公开对旧秩序提出挑战。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一方面加剧了它与英国等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导致国联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另一方面促成了德意法西斯的勾结。德国通过对意大利在非洲行动的支持，换取了意大利放弃在奥地利、巴尔干和多瑙河流域的争夺。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德意在武装干涉西班牙的过程中进一步勾结。1936年10月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访问柏林期间，与德国外长牛赖特达成如下秘密协议：德国承认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德意两国在重要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双方承认西班牙佛朗哥政权；两国共同合作，加紧发展空军；在多

瑙河和巴尔干划分了两国的势力范围。随后墨索里尼在米兰发表演说，叫嚷“新的时代已经开始”，欧洲各国可以围绕“罗马和柏林之间的垂直线”这一“轴心”进行合作。所以这个协定被称为“柏林—罗马轴心协定”。^①

1936年8月，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旨在进一步扩张的《基本国策》，为了寻求支持，广田内阁决定加强与德国的合作。同年11月25日，日德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两国在反苏反共的基础上缔结成政治同盟，利用帝国主义恐苏反共的特点掩盖其侵略实质。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该协定，“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形成。日本承认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兼并，德意则承认了日本一手制造的伪满。

1938年，德国准备东进和日本陷入中日战争的泥沼，使两国都感到有进一步合作的必要，他们都希望把过去的政治同盟发展成军事同盟，但在他们的针对对象上两国发生分歧，日本向沿着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思路，建立主要针对苏联的同盟；德国因为准备东进，它更希望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英法。在日本内部就同盟问题争吵不休的时候，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德同盟暂时搁浅。

1940年德国在欧洲的“成功”再一次勾起了日本结盟的愿望，日本希望利用与德国结盟的威慑力尽快解决中国问题，并依靠德国的斡旋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同时还希望在德国腾出手之前实现南进，从而确立它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德国眼见英国迟迟不肯就范，美国又不断加大它对欧洲战争的卷入程度，也希望借日本之力，牵制美国，日德各有所求，三国同盟也就瓜熟蒂落。

^① 另外参见堀内谦介：《日本外交史》21，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版，第46—48页。

（三）日英同盟及相关问题的史料和研究状况

日英同盟及相关问题的史料：日英同盟及相关问题的原始档案从英国来说，首先是外交部系列的来往文书总档日本卷（FO46，FO371）、中国卷，包括朝鲜（FO17），使馆和领事馆档案日本卷（FO228）；其次是内阁和国会系列的内阁综合记录（Cabinet 1）、帝国防务委员会文件（Cabinet2—20）；另外重要的还有个人文书和档案，如：索尔兹伯里（Salisbury）文书、兰斯敦（Lansdowne）文书、格雷（Grey）文书、萨道义（Satow）文书、温莎皇室（Royal Archives, Windsor）档案、伯明翰大学图书馆（University Library, Birmingham）档案、剑桥大学图书馆（University Library, Cambridge）档案、牛津大学图书馆（University Library, Christ Church, Oxford）档案、格林威治海事博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档案、国防部海军图书馆（The Naval Library, Ministry of Defence, London）档案等；从日本方面来说，有美国摄制的缩微胶卷《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VM6、《日本陆海军档案》（1868—1945）有关部分。已公开出版的文献材料有：*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1898—1914 vols. I—IV；*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英国议会文书）中的“关于中国骚乱情况的来往文书”及其“续编”；*British Parliamentary Debates*（英国议会辩论记录）；《法国外交文书》第一集11—15卷和第二集1—7卷、《德国外交文件》（1871—1914）第15、16、17卷；俄国《红档》NO14“义和团运动”、NO52“俄罗斯帝国在远东的第一步1888—1903”、NO63“日俄战争的前夜1900年12月至1902年1月”；*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西奥多·罗斯福通信集），vols. III—IV；《日本外交文书》28—36、38—45、大正1—2（3）；《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外交文书》上；《桂太郎文书》：

《新闻集成·明治编年史》(10—15卷);《清季外交史料》;《清光绪朝中日交涉资料》;《清宣统朝外交史料》;《清宣统朝中日交涉资料》;《列国对华约章汇编》;《近代中国外交史料汇刊30种》;《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另外还有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如《伊藤博文秘录》、《伊藤博文秘书类纂》、《林董回忆录》、《维特伯爵回忆录》等。

日英同盟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专门研究日英同盟的著作主要有:鹿岛守之助的《日本外交史》第6、7、9卷;黑羽茂的《日英同盟研究》、《日英同盟的轨迹》;张忠绂的《英日同盟》;尼什的《英日同盟——两个岛屿帝国的外交》(*Nish, Ian H : The Anglo - Japanese Alliance —the Diplomacy of Two Island Empires 1894 —1907*)和《同盟的解体——1908—1923年的英日关系研究》(*Alliance in Decline —A Study in Anglo - Japanese Relation 1908 —1923*);丹尼斯的《英日同盟》(*Dennis : The Anglo - Japanese Alliance*);加尔珀瑞恩的《英日同盟 1902—1921》(*Galperin A. L : Anglo - yaponskii soiuz*)。日英同盟相关问题研究的著作不胜枚举,我已找到的就有:日本外务省编的《小村外交史》、《日露交涉史》德富猪一郎编的《公爵山县有朋传》、《公爵桂太郎传》;春亩公追颂会编的《伊藤博文传》;伊藤正德编的《加藤高明传》;信夫淳平的《明治秘话·二大外交的真相》信夫清三郎编的《日露战争史的研究》;鹿岛守之助的《日英外交史》;罗曼诺夫的《日俄战争外交史纲》;马洛泽莫夫的《俄国的远东政策》(*Malozemoff ;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杨国伦的《英国的对华政策》(*Young , L. K. British Policy in China*);伍德的《中国、美国和英日同盟》(*Wood , G. Z. China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nglo - Japanese Alliance*)等。为纪念日英同盟成立100周年(2002年),国内外学界关于日英同盟的研究又有